

学校代码: 10200

分类号: K23

研究生学号: 1053203034

密 级: 无



**东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研究**

**The Study on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Schools in the  
Northeast of Modern China**

作者: 邹丹丹

指导教师: 高乐才 教授

学科专业: 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文化史

学位类型: 学历硕士

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06年5月

## 独 创 性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邹丹丹 日期： 2006.6.6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东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东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东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邹丹丹 指导教师签名： \_\_\_\_\_  
日 期： 2006.6.6 日 期： \_\_\_\_\_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 \_\_\_\_\_ 电话： \_\_\_\_\_

通讯地址： \_\_\_\_\_ 邮编： \_\_\_\_\_

## 摘 要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传教士也随着列强的炮舰和廉价的商品纷至沓来。他们尽管借助条约特权的保护打开了在东北传播“福音”的通道，但在东北的初期布道活动却并非一帆风顺。因此要打开传教局面，必须采取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手段，由教堂转向课堂，传教士们视此为拯救东北人民“灵魂”、传播基督“福音”之捷径。因此，手捧《圣经》的传教士先后在东北创办教会学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充当了中国东北和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角。

本文以东北地方史志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以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东北创办教会学校的活动为考察对象，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基督教在东北创办教会学校的历史背景。从基督教进入东北并开始初期传播入手，来分析其办学的动因。为缓解传教布道之艰难，传教士们把创办教会学校作为传播基督“福音”之平台，希望借此来提高基督教会地位，达到吸引东北人民入教的目的。

第二，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创建与发展。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基督教逐渐在东北建立起一个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到女学等不同层次和类别的颇为完整的基督教教育体制，并因此达到了“以学辅教”的目的。

第三，对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历史评价。基督教教会学校在近代中国东北创建与发展的过程中，除具有“征服中国”使命的同时，客观上开了近代东北新式教育的先河，推动了东北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

##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go into China with the imperialistic gunboats and cheap commodities. Despite they opened the "Gospel" corridors with the protection of privileges by treaties, the initial sermon activities have not been all right. Therefore, in order to open the missionary situation, the means must be adapted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from the church to the classroom, the missionaries regarded this as the shortcut of Save-people "soul" and the spread of Jesus "Gospel". Thus, the missionaries who are holding the "Bible" have established missionary schools, over a rather long period of time they served as a leading force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Based on the history records of the Northeast of China and the history cultural heritage datum,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ctivities of the missionaries established the missionary schools in the Northeast of modern China and carries on the discussion from the thre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 history background of the Christianity established missionary schools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The reason why Christianity established missionary schools is analyzed from the Christianity got into the Northeast and preached in initial stage. To alleviate to the difficulties of preaching, the missionaries established missionary schools as to spread the terrace of Jesus "Gospel", for raising the posi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achieving the basic goal that attracting peoples in the Northeast to convert to Christianity.

Seco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schools in the Northeast. From the end of 19 centuries to the middle period of 20 centuries, the Christianity started to build up missionary schools from kindergarten, primary school, high school, university to female in the Northeast gradually. Eventually a very complete Christianity's educational system which contained different layers and categories is established, so the purpose of "assist by learn to teach" is achieved.

Third, the apprais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schools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In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schools in the Northeast of modern China,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schools have "conquer China" mission, meanwhile they established a new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e Northeast of modern China objectively and pushed up the educational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odern times; The Northeast of China; Christianity; Missionary schools



# 目 录

中文摘要 .....	I
英文摘要 .....	II
引 言 .....	1
一、基督教在东北创办教会学校的历史背景 .....	3
(一) 基督教进入东北及其传教活动 .....	3
(二) 基督教在东北创办教会学校的动因 .....	4
二、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创建与发展 .....	7
(一) 教会初等学校 .....	7
(二) 教会中等学校 .....	11
(三) 教会高等学校 .....	15
(四) 教会女子学校 .....	17
三、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历史评价 .....	21
(一) 教会学校旨在为“基督征服中国”服务 .....	21
(二) 教会学校客观上推动了东北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	22
结 论 .....	25
参考文献 .....	26
后 记 .....	30

## 引 言

教育是人类生存、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之一，教育自始至终为东北的建设和进步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自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东北创办教会学校，旨在为“基督征服中国”，然而客观上却推动了东北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对此问题加以研究，将会丰富和深化东北史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揭示东北历史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更好地为东北的繁荣富强服务。

宗教问题一直是国家比较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加，作为我国法定的合法宗教组织之一的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是保持国家安定团结、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又离不开对宗教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地把握。基督教史的研究对于国家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加强对东北地区基督教问题的研究，从中探索规律、总结经验，引导基督教组织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振兴东北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笔者目力所及，国外关于东北地区宗教问题的研究，主要论著有：[日]芝田研三著《满洲宗教志》、[美]杰西·格·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韩]李宽淑著《中国基督教史略》等。《满洲宗教志》是满铁铁道总局弘报课组织编写的关于近代中国东北地区宗教现状的一部调查资料性专著，其中关于基督教部分，主要记述了基督教在东北地区的发展沿革、现状以及相关的早期传教士事迹、信徒分布等情况。这些著作作为本论文的形成提供了很多背景资料，但它们并没有就某一方面作进一步的专题性探讨和研究。

从国内来看，东北地区基督教问题研究尚属薄弱。其中对东北基督教的某些问题在一些著述中有所提及，如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卫民的《基督教会与近代中国社会》、胡卫清的《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黄新宪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何晓夏、史静寰的《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等。这些著述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作用及其影响，对本文的写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本文的史料则主要来源于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的《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上，中，下卷；由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辽宁省志·宗教志》、《吉林省志·宗教志》、《黑龙江省志·宗教志》以及三省教育志等志书，书中关于东北基督教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情况的介绍，对本论文的写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借鉴意义。

本文从教育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入手，以东北地方文献资料为依托，把近代基督教在

中国东北创办教会学校作为研究的核心，旁及教会传播、办学动因以及教会学校的发展状况和历史评价等方面，对东北地区基督教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注：1. 在中国，“基督教”一词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基督教是对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之各教教派的统称，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狭义基督教专指基督新教。本文所用“基督教”一词取狭义基督新教之意。

2. 历史上，“中国东北”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指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等地区。本文取狭义之说，仅指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 一、基督教在东北创办教会学校的历史背景

### （一）基督教进入东北及其传教活动

#### 1. 基督教进入东北

基督教早在十七世纪就已陆续传到中国，但由于中国政府的限制，直到 1840 年传教士也不过 20 余人。“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sup>①</sup>，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望厦条约》（1844 年）和《黄埔条约》（1844 年）的签订，允许外国人在开放的商埠内建立教堂，进行宗教活动，开始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条约》（1858 年）和《北京条约》（1860 年）又相继规定：外国人可以任意在内地游历、通商、传教，并把以前没收的教会和慈善机关设施全部归还给天主教会。实际上就是同意各国传教士可进一步到包括原本封禁的清王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的东北地区在内的各地租买田地，建立教堂，自由传教。“新条约为 1860 年以后传教活动的空前大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sup>②</sup>。此后，西方各国教会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以各通商口岸为据点，长驱直入，深入内地，以实现他们用基督思想来征服中国的目的。据 1923 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 1072 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 126 县，其余都树立了基督的旗帜。”<sup>③</sup>解放前夕，基督教（包括新、旧教）在中国的信徒总数已达 200 多万人。基督教传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由此可窥一斑。

1858 年，《天津条约》规定：牛庄于 1861 年 4 月开埠。中国东北的南大门就这样被强行打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相继在营口设立领事，开设洋行，并将其政治、经济势力从这里迅速向东北内地扩展。伴随与此，基督教会也纷至沓来，开始以营口为踏板，将触角肆无忌惮地延伸于中国东北的每个角落。

#### 2. 基督教在东北的初传情况

清朝同治年间，基督教逐渐进入中国北部。《奉天通志》载，基督教于“同治六年，始在营口创设福音堂。”<sup>④</sup>又据《满洲宗教志》，英国圣书会社传教士于 1866 年从牛庄登陆，到东北散发汉译《圣经》，足迹远达扶余、阿城、三姓（今黑龙江依兰）等地。<sup>⑤</sup>这就揭开了基督教向东北传播的序幕。在《辽宁省志·宗教志》中记述更为详尽：“同治五年（1866 年），英国苏格兰圣经会韦廉臣受英国长老会的委托，来到营口，但未久留。翌年，英国牧师宾维廉，从北京移驻营口传道。同治七年（1868 年），设东西街两福音

<sup>①</sup>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46 页。

<sup>②</sup>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11 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译：《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版，第 61 页。

<sup>④</sup> 王树楠等编：《奉天通志》卷 99，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委会，1983 年影印本，第 2273 页。

<sup>⑤</sup> [日]芝田研三：《满洲宗教志》，大连：满铁社员会，1940 年版，第 269 页。

堂，当时有外地在营口的一些商人入教。同年宾维廉病逝，安葬于此地。他被视为东北基督教的“立基人”<sup>①</sup>。

差会由英语一辞译来，即国外布道会。最早在东北传教的基督教差会，是系英国长老会系统的爱尔兰长老会和苏格兰长老会。它们在牛庄、沈阳、辽阳、锦州、宽城子开辟了东北地区最早的五个宣教师驻在地。<sup>②</sup>1891年，两派合并组成满洲长老会，至1917年，在中国东北已拥有19所总堂，48所支堂，来华西教士97人，信徒19522人。<sup>③</sup>之后，又增丹麦路德会，属信义宗。这三个差会在布道过程中互相提携，“1910年之前，东北三省共有总堂25所”<sup>④</sup>。到1920年以前，三个差会已发展成为东北三省势力最大的宣教会。他们在已开辟之宣教地内共有布道区294个，多数在辽河平原及沿主要交通线一带，东部北部则岭深林密，布道区极少。<sup>⑤</sup>在发展信徒方面，这三个差会在东北三省也是独占鳌头。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01年到1920年二十年间，基督教在东北三省共建立差会总堂37所，其中丹路德会12所，爱长老会9所，苏长老会9所；正式教堂85所，其中丹路德会23所，爱长老会25所，苏长老会32所；受餐信徒20586人，其中丹路德会1405人，爱长老会9024人，苏长老会9909人。<sup>⑥</sup>

## （二）基督教在东北创办教会学校的动因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东北地区创办了很多教会学校。传教士的主要任务是传教布道，表面看来创办学校并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尽管如此，他们仍不遗余力地在东北发展教育事业，这又是为什么呢？

第一、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传教士与列强的炮舰和廉价的商品随之涌入。他们尽管借助条约特权的保护打开了在东北传播“福音”的通道，但在东北的初期布道活动却并非一帆风顺。东北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差会中外职员不敷分配，致使宣教工作力不从心。特别是东北人民对从内容到形式都非常陌生的基督教态度冷淡，布道时听众寥寥，分发的宣传小册子被当作废纸出卖。著名传教士杨格非曾经感叹，中国人似乎是我所见到和了解的最漠不关心、最冷淡、最无情、最不要宗教的民族。他承认：“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sup>⑦</sup>还有一些传教士甚至认为，直接对民众传经布道就好比把种子撒在水里一样徒劳无获。以宗教信仰改变中国的最初尝试屡屡碰壁，再加上东北人民排教情绪异常强烈，传教士在东北的初期传教工作步履维艰，收效甚微。这从当时在东北的一些传教士著述以及现存地方志中可窥一斑。《营

<sup>①</sup>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省志·宗教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sup>②</sup>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中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7页。

<sup>③</sup> 黄光域：《近代来华新教差会综录》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4—96页。

<sup>④</sup> [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sup>⑤</sup>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中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9页。

<sup>⑥</sup>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中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5页。

<sup>⑦</sup> 陶飞亚：《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340页。

口市志》载，1867年7月，“法国使馆照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牛庄、营口地方聚众反对外国‘洋人’，望严加禁止。”<sup>①</sup>据《满洲宗教志》，“当时满洲排外气氛最浓厚为吉林，外国传教士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一块定居的地方。”<sup>②</sup>有英国传教士高积善于1888年在此传教，被人怀疑为拐卖幼童者，遭痛打，后被监禁。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传教士当时在东北传教布道之艰难，故把兴办教会学校作为传播基督“福音”之平台，以便为以后在东北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第二、当传教士一踏上东北这块古老的土地，首先真切地感到，近代东北人民笃信教育。他们从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和利玛窦推行教育成功的经验中认识到，“在中国，教育极受人们推崇，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社会上所能起的影响极有限”，<sup>③</sup>东北地区也是如此。因此，传教士们感到要在此打开传教局面，必须采取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手段，教育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认为“基督教会应把教育作为它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up>④</sup>，“没有教育作为媒介，我们在像中国这样的民族中的传教努力是最为劳而无功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一直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sup>⑤</sup>，如果“我们的教育办得越来越好，我们的教会就会更英明，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影响整个中国。”<sup>⑥</sup>另外，传教士们还深切感受到，近代东北人最需要的是西方的科学文化，而不是基督教，如果他们不想继续碰壁，就必须改变传教方针，至少要寓宗教于科学，借科学来过渡宗教。所以，手捧《圣经》的传教士先后在东北创办教会学校，开了近代东北新式教育的先河，被历史推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充当了中国东北和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角。

最后，由教堂转向课堂，传教士们视此为在东北拯救“灵魂”、传播“福音”之捷径。为了更好地推广基督教，传教士认为，“教会学校是传播福音的最有效的方法，……学校是最好的教堂”，让“许多学生皈依上帝，成长为我们最坚强、最聪明的基督徒和福音布道者。”<sup>⑦</sup>传教士倪维思（J. L. Nevius）曾明确地讲道：“在中国办学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传教方法，它们只花费差会的力量和传教士的劳力与时间约四分之一，却为该地教会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教徒。”<sup>⑧</sup>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的最初动因由此昭然若揭，就是吸引信徒和培养传教助手。后来，他们在兴学过程中逐渐发现教育活动既可以有效地消除东北人们的敌意，又可以争取众多的异教男女皈依上帝，并进而影响学生家长，达到扩散“福音”的目的。所以创办教会学校成为他们宣传宗教和培养信徒的主要场所。1834年美国公理会给来华传教士的指示已经非常鲜明地对此作了表述，“把用生动的语言宣讲福音作为传教士的伟大事业，准备和分发圣经小册子为其次，而办学和旨在改革

<sup>①</sup> 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营口市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sup>②</sup> [日]千田万三：《满洲文化史·点描》，大阪：屋号书店，1943年版，第128页。

<sup>③</sup> 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sup>④</sup> 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sup>⑤</sup>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243页。

<sup>⑥</sup>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sup>⑦</sup> 朱有瓛、高时良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20页。

<sup>⑧</sup>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社会的活动应永远严格地作为从属活动。”<sup>①</sup>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也曾这样表述当时的教会学校状况：“特基督教会之学校，初非专门之教育家所设立，其志亦并不在教育人才以促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sup>②</sup>由此可见，传教士们希望借办学来达到提高基督教会地位、吸引东北人入教的目的。

---

<sup>①</sup>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sup>②</sup> 朱有璠、高时良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 二、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创建与发展

伴随基督教的传入和发展，基督教在东北的教育事业也随之产生。据不完全统计，基督教会在东北共创办教会学校（包括幼稚园）约 370 余所。其中辽宁境内 200 余所，吉林境内 130 余所，黑龙江境内 20 余所。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基督教逐渐在东北建立起一个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到女学等不同层次和类别的颇为完整的基督教教育体制。笔者据现查阅到的相关资料统计，基督教会在近代东北创办教会幼稚园 20 所左右，教会小学 300 所左右，教会中学 20 余所，教会大学 2 所，教会女校 20 余所。

### （一）教会初等学校

近代初等教育，包括学龄前教育和小学<sup>①</sup>。在东北创办教会学校并非是用来华传教士的初衷，他们越洋涉险是为其所信仰的宗教“拓荒”的。但是，当他们发现无论口头说教还是散发宗教小册子都对怀有“敌意”的成年人几乎不起作用时，少数传教士便把宣教的目光转向了少年儿童。

#### 1. 教会幼稚园

基督传教士把西方的学前教育机构——幼稚园（又称小孩察物学堂）引入中国。在他们看来，“幼稚之年，正就我范围之时”，“故上帝之宝座，可藉教室之讲台而至者，藉儿童之游戏而亦至”<sup>②</sup>。传教士麦女士曾言：“欲选民主国国民根基，除幼稚园外，无他术也；欲使街巷顽童、家中劣子，成为安分之小国民。除幼稚园外，亦无他术能收效若是之速也。”<sup>③</sup>由此可见，幼稚园已被视为传播基督“福音”之最佳场所。1913 年，基督教全国会议议案规定，各地教堂都要附设幼稚园。此后，东北地区便出现了教会创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幼稚园。兹列表如下（见表 1）。

1923 年 1 月 1 日起，奉天省教育厅执行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新学制，号召城乡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兴办各类学校，以发展教育。锦县基督教会，鉴于东关施医院和育贤中、小学校教职工和医院医务人员不断增加，为解决教职工和医务工作者的后顾之忧，于是在施医院筹建幼稚园 1 所——基督教立育英幼稚园。园址设在育英小学校内，由该校校长孔繁生（字雨春）兼任园长。聘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岳幼樵夫人孙某和王雅彬为保育员。当时有儿童 30 人，大部分是基督教徒子女。常年办园经费为 500 元，多用于

<sup>①</sup>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76 页。

<sup>②</sup> 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15 页。

<sup>③</sup> 麦女士：《基督教女子教育》，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 年版，第 82 页。

添置设备之用。课程设：识字、唱歌、计算、游戏等科。该幼稚园于 1923 年经锦县公署批准，报奉天省教育厅备案。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加紧控制基督教活动，后育贤、育英小学，由伪锦州市公署接管。育英附设幼稚园，也随之解体。<sup>①</sup>

表 1. 近代中国东北主要基督教会幼稚园一览表

地域	学校名称	创办人	校 址	时间（年）	
				起	止
辽宁省	育英幼稚园	——	锦州育英小学校内	1924	——
	崇正幼稚园	——	安东大孤山	1912	——
	青年会幼稚园	——	辽宁锦县	1929	——
吉林省	临江幼稚园	——	吉林临江县	1934	——
	四平幼稚园	——	吉林四平街	1946	——
	文化幼稚园	邸如春	吉林高大夫医院院内	1925	1934
	萃文幼稚园	——	长春西五马路（后西三道街）	1918	1950
黑龙江省	仁母幼稚园	——	哈尔滨西门脸	1926	1952
	新民幼稚园	张海云	哈尔滨道里端街	1938	1952
	明道幼稚园	贾晓山	佳木斯市安民街	1938	1945
	崇俭幼稚园	刘殿和	哈道外北大六道街	1939	1952

注：本表参考了《辽宁省志·宗教志》（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1 页）、《吉林省志·宗教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7—348 页）、《黑龙江省志·宗教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6—307 页）以及《哈尔滨市志·宗教 方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5 页）等相关资料。

黑龙江省基督教会为了解决信徒子女入托问题而创办教会幼稚园，为黑龙江的学前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尤以“仁母幼稚园”和“明道幼稚园”最为典型。

1926 年，西门脸信义会创办了哈尔滨第一个“幼稚园”，开始招收幼稚生 20 余人，1932 年移交教会教育部直辖。每年可招收幼儿 70~80 人，日本投降后有大发展，定名为仁母幼稚园。至 1952 年接受教育局学前科领导，以后与教会脱离关系，由国家直接经营，原有工作人员成为哈尔滨托幼事业的先驱者。<sup>②</sup>此后，黑龙江省基督教会幼稚园数量大增。

1938 年，基督教原浸信会牧师贾晓山等人创办了明道幼稚园，地址在佳木斯市安民街教堂。贾兼任该园园长。明道，隐含明白基督教《圣经》道理之意。1938 年末，办园经费由教会执事李宝安、曲寿笈各捐 600 元，购置黑板、积木等教具及用品。1939 年初秋，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生。凡年龄在 5~7 岁间，没有传染病的儿童都可报名入园。每天上 3 节课，每节 20 分钟。实行半日制一班教学，学制为二年。该园的保障人员都是基督徒。没有统一教材，上课内容及教法由教养员自己安排。一般设唱游、故事、自

<sup>①</sup> 政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委员会学习文史办公室编印：《凌河文史资料》，1989 年版，第 58 页。

<sup>②</sup>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哈尔滨市志·宗教 方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15 页。

然等科目。另外还注意培养孩子的道德修养。这是佳木斯最早的幼儿园，1939~1945年共招收3期，入园儿童达90多人。<sup>①</sup>

## 2. 教会小学

近代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新式小学，是由基督教会开始创办的。传教士们在总结小学教育的作用时说：“教会小学最初设立之宗旨为宣传福音。其目的在破除偏见，招致学生父母之信任，并在城镇中设立一种公认之教会机关，而使人信奉耶教。”<sup>②</sup>应该说，小学是传教士在东北经营的重点且发展很快。兹制下表，可窥一斑（见表2、表3）。

表2. 东北三省教会小学统计表（1901—1920年）<sup>③</sup>

组织	数量		初小		高小		初小学	高小学
	初级小学	高级小学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生总数	生总数
信宗 丹路德会	29	11	449	793	49	142	1242	191
监宗 美以美会	6	—	45	115	—	—	160	—
长宗 爱长老会	87	15	726	1224	132	180	1950	312
苏长老会	99	12	1373	1391	127	139	2764	266
余会 复临安息	1	—	8	4	—	—	12	—
男青年会	1	1	—	57	—	124	57	124
总数	223	39	2601	3584	308	585	6185	893

### （1）辽宁省教会小学

东北基督教教会小学中，以辽宁省的锦州育贤小学最具代表性。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英国传教士伊约翰来锦州布道，在锦县（锦州）东关福音堂（福德街）创立育三小学，为育贤小学之前身。最初招收初小一个班，多是基督教信徒子弟。教育经费主要靠学生学费支付，不足部分由奉天爱尔兰差会捐助。据《锦县志略》记载，到民国初年，育三小学有高等一个班，学生25名；初等一个班，学生30名。中国教师3名，美国教师1名。高小班课程有修身、国文、英文、算术、体操、音乐、图画等；初小班

<sup>①</sup>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宗教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307页。

<sup>②</sup> 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5页。

<sup>③</sup>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中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7页。

不设英文，其它课程和高等班相同。<sup>①</sup>1923年1月执行民国新学制，遵令改组为四、二制两级小学校（国民级4年、高级2年毕业），该育三小学改为锦县基督教私立育贤初级中学校附属育贤两级小学校。新学制规定，私立学校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育贤因而改由中国人孔繁生（孔雨春）牧师担任校长。1932年锦县被日本人侵占后，曾一度停课。1935年10月日伪当局为加强法西斯统治，逮捕了史梦符和小学部主任何世义等多名教员和一部分学生，育贤小学不得不全部停课。1936年5月复课后，育贤小学改由王仁甫牧师担任校长。1938年，按照伪满的新学制，改为育贤国民学校。1942年，由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英关系更趋紧张，日伪当局迫令育贤小学停办。<sup>②</sup>1945年又复校，改为私立育贤小学，1948年10月解放。1952年，由锦州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申请移交给锦州市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3月25日，经锦州市人民政府批复，改名为锦州市福德街小学校，现在为古塔区饶四小学校。<sup>③</sup>

育贤小学是锦州城区第一所小学，它经历了清朝、民国、伪满、国民党统治时期、新中国等五个时代，历时57年。

## （2）吉林省教会小学

据笔者对现有资料考证，基督教会于吉林省创办最早的教会小学是榆树县文华小学，由英国牧师孟宗源、中国刘舒齐等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立，在北关租房，初为一个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迁到南关。

1942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穆文焕传教士为招收信徒子女，培养他们懂得圣经道理，普及小学程度的文化知识创办三育小学，校址在吉林市今船营区晋隆胡同20号，以该教会的房舍为教室，接受美国华盛顿全球总会的津贴。初招学生20人，教师1名。除使用普通学校课本外，还有一套教会课本。1957年4月，由于断绝了与差会的关系而停办。

## （3）黑龙江省教会小学

基督教会为解决信徒子女上学问题而在黑龙江地区创办教会小学。据笔者统计，约办有10所教会小学校，为黑龙江的初等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下面，仅以两所小学为例：

新育小学校，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哈尔滨新阳路教会负责人杨松山，借用教会礼拜堂于1948年创办的一所小学校。招收学生40人，自己兼职任教。以后有所发展，学生曾增至100人，聘用教师2人。1952年秋奉教育局指示，将教员与学生连同教学用具，一并交安广小学校。这是笔者现查阅到的关于黑龙江省招生最多的基督教会小学校。<sup>④</sup>

广育初高两级小学校，由呼兰长老会英籍牧师孙文彬于1910年创办。最初称广育中学附属小学，1919年停办后改名为中华基督教私立广育两级小学校。1935年，经伪满县公署立案，又改名为呼兰县私立广育初高两级小学校，仍由教会领导。1944年，因

<sup>①</sup> 政协锦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锦州文史资料》，第九辑，1990年版，第98页。

<sup>②</sup> 政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员会学习文史办公室编印：《凌河文史资料》，1989年版，第50页。

<sup>③</sup> 政协锦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锦州文史资料》，第九辑，1990年版，第99页。

<sup>④</sup>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哈尔滨市志·宗教方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伪满当局征用校舍被关闭，当时教职员 6、7 人，学生 190 余人转至其它学校。<sup>①</sup>

表 3. 近代中国东北主要基督教会小学一览表

地域	学校名称	创办人	校 址	时间（年）	
				起	止
辽宁省	育贤小学	（英）伊约翰	锦县东关福音堂	1895	1952
	培英小学	柏 卫	大孤山	1905	——
	三育小学	——	鞍山岫岩	1911	1941
	文华小学	——	奉天	1915	1940
	三育小学	于承恩	安东劈柴沟	1912	——
	育贤小学	（英）卜敬之	朝阳	1908	——
吉林省	三育小学	穆文焕	吉林船营区晋隆胡同	1942	1957
	文华小学	（英）孟宗源等	吉林榆树	1897	1938
	文达小学	——	吉林柳河	1903	1945
	慈育小学	——	吉林双阳	1946	——
黑龙江省	三育小学	武百祥等	道外保障街	1915	——
	三育小学	张子才等	哈尔滨香坊	1912	1940
	崇德小学	——	道外正阳十一道街	1930	1945
	广育小学	（英）孙文彬	呼兰信德胡同	1909	1944
	新育小学	杨松山	哈尔滨新阳路	1948	1952
	文育小学	（英）苏担理	阿城	1929	——

注：本表参考了《辽宁省志·宗教志》（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吉林省志·宗教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黑龙江省志·宗教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相关资料。

## （二）教会中等学校

居于教会中等教育核心地位的教会中学，在实现基督教教育事业中，倍受西方教会的垂顾，被视为教会学校体系中“一最重要之部分”。<sup>②</sup>传教士狄考文将教会中学的发展目标这样表述，“中国基督教会下一代的中坚人物无疑将由我们的教会中学来培养”<sup>③</sup>。光绪二十六年（1901 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控制清政府，教会势力也得以迅速发展。此后，东北地区各国教会趁清政府实行“新政”、兴办新学的机会，大力发展教会教育。他们在继续发展初等教育的同时，集中力量发展普通中学教育。据统计，仅 1918—1919 年两年间，东北的教会中学就有 14 所，学生总计 46 人。其中 8 所中学为四年制，另有 2 所二年制和 4 所三年制的中学。

<sup>①</sup>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哈尔滨市志·宗教 方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14 页。

<sup>②</sup> 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79 页。

<sup>③</sup> 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4—15 页。



在这 14 所中学之中，12 所有附属高级小学，11 所有附属初级小学。<sup>①</sup>到 1921 年，已发展成为 16 所，学生总数 521 人。<sup>②</sup>难怪有人如此评价说：“1900 年以前，基督教教育之宗旨，在于训练信徒儿童，今则此种教育范围，业经扩大，已为全国普通生活之补助矣”。<sup>③</sup>据初步统计，基督教会在东北地区共创办 18 所较有影响的中学，其中奉天省 13 所，吉林省 3 所，黑龙江省 2 所。兹制成近代中国东北主要基督教会中学一览表（见表 4）。

辽宁地区的基督教会中学几遍全省，统一领导机构为基督教育会，设在辽阳。具代表性的教会中学有海城三育、辽阳文德、新民文会和锦州育贤等。

### 1. 海城三育中学

光绪十六年（1890 年），英国传教士马钦泰牧师来海城传教。除在县内广泛吸收教徒、积极扩展教会势力外，还成立了三育中学。这是笔者查阅到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东北建立的最早的教会中学。校舍设在九仙庙下一家马姓民房。学生均为教徒子弟，不收学杂费，补助伙食和笔墨纸张等文具费。所学课程以《圣经》和英文为主要学科，四书五经为次要学科。马钦泰亲自讲《圣经》，妻子“马师娘”教英文。另请徐老师教四书五经，请牛庄人王好古教算术、物理、地理等。当时称这些学科为“格致”。最初招收学生二十人。学习年限不定，以能学会英语会话、翻译简单信件和阅读英文报刊为结业标准。结业后由教会负责推荐职业。牛庄、海城义和团起义后，马钦泰携眷逃离海城回国，这时教会归当地人自办，经费异常困难，主要靠少数富有信徒捐助。于是长老杨博泉倡议继续办学，并扩大招生名额，取消免费供给和膳费补助等优惠，一律收学杂费，以维持教会开销及办学经费。<sup>④</sup>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在海城县知事管凤和（此人重视新学、思想较开明）的大力支持下，三育中学又恢复成立。校舍设在城里东北角（现啤酒厂院内）。学生共八十人，分初、高两级两个班。初等为十八元，高等收学杂费二十四元。校内有宿舍五间，饭厅五间，另有教室。“马师娘”仍教英文，聘城西北大莫屯的张仙樵（前清拔贡）教汉文，从沈阳聘来马献图教算术、物理、地理，又请当地警官宫信涛（西关人）为体育教员。校长仍由教会牧师兼任。每天除正常上课外，早晨还要由牧师讲一小时“圣经”。另外，每星期日上午全校师生必须参加“礼拜”，午后允许学生自由活动。每天上午的课程主要是算术、物理和地理，下午统学英文。新“三育”毕业生择优保送，去邮政、海关、铁路、电报等各机关的有三十余人，教徒均认为“美差”，因而纷纷送子弟入学。1916 年又增加一个班，同时增聘海城名师从教。为了加强校务管理，教会又重新改组成立了董事会。这期毕业生大部分考入了各省教会所属大专院校。后来因为海城教会与辽阳教会合并，且海城教会归属于辽阳教区，三育中学遂于 1921 年停办。

这个学校从成立到解散，近三十年。虽然旨在以宗教思想奴化麻醉中国青年，培养

<sup>①</sup>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895 页。

<sup>②</sup> 朱有瓚、高时良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92 页。

<sup>③</sup> 朱有瓚、高时良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45 页。

<sup>④</sup> 政协辽宁省海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海城文史资料》，1988 年版，第 18 页。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奴仆为目的，但不可否认也为地方造就了不少人材。<sup>①</sup>

## 2. 辽阳文德中学

此校由苏格兰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德教治，于1913年购买东五道街天齐庙路南庙会演戏地址而修建。房舍约七百五十平方米，共四个教室，一个实验室和一个教员室，及一个可容八十名学生的宿舍和附属设施。设三年制中学三个班。实际学生人数平均每班二十人，全校共有学生七、八十人。主要招收基督教徒家庭子弟，并吸收少量教外学生。主要学习经学，以四年为主；后改为国文。还设有圣经、英文、数学、物理、化学、格致（动植矿）、历史、地理、音乐等科目。除英文、音乐由英国牧师讲授外，其它各科均由中国教员担任。虽然未设体育课，但学生课余时间必须参加足球等体育活动。圣经课每周讲授二节，作为必修科目。另外每天早晨上课前，举行二十分钟礼拜仪式。1923年，遵照国家规定，改成新学制。于是文德中学改为秋季始业，实行高小二年制，初中三年制。到1924年秋，学校共有高小二个班，初中三个班，共计学生一百三十余人，校名为文德初级中学。1938年，又按伪满政府令，改名为私立辽阳文德国民高等学校（商科），学制四年，又改为春季始业，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只有一个班。自1923年改革学制起，除圣经课延续到1928年外，其它课本均按国家规定，采用商务印书馆本。直到1928年，国民党统治中国，接受教育部命令，取消圣经课，改授三民主义课。“九·一八”后，日本统治东北并进行奴化教育，又改用伪满教材，并增添了日语课，直到1934年夏为止。1938年改为国高学校后，因是商科，又增加了商事要项、珠算和簿记课程。自1940年12月起，改为奉天省立辽阳第四国民高等学校。<sup>②</sup>

## 3. 新民文会中学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英国传教士孟中原以基督教会名义出资主办文会中学。校址设在镇南，从回民海姓家族购得，占地30亩，建校舍洋房三栋30间（今县高中校内东侧）。初创时办初级中学两个班，84名学生，聘教师9人。1908年，第一届毕业生仅10余人，学生来源除本县外，还有黑山、法库、辽中等县。所学课程，国文除《三字经》、《百家姓》外，以四书为主，另学数学、英语和书法，但不开体育、音乐、美术等课。圣经作为必读课，且学生每天要参加宗教仪式或作礼拜。1913年，校舍因水患被毁。后孟中原牧师于1915年重建二层小楼两栋（今仅存西南楼，计48间），经修缮和扩建规模逐渐扩大。1920年春，学校开始招收高中一年级新生一个班，学生不足30人，直到1919年又经费不足，高中停办。课程除国文、数学、地理、历史、英语外，又增设物理、化学、修身（道德伦理教育）等课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学校瘫痪一年，第二年开学，保留初中五个班和三个年级。当时学生160人左右，教职员11人。学校仍受教会指导，每周按惯例作礼拜。1940年，文会中学被伪满当局接收，更名为“奉天省新民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简称“二高”。<sup>③</sup>

## 4. 锦县育贤中学

<sup>①</sup> 政协辽宁省海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海城文史资料》，1988年版，第20页。

<sup>②</sup> 辽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辽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版，第78—83页。

<sup>③</sup> 新民县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印：《新民文史资料》，第三辑，1990年版，第11—14页。

它的成立源于清光绪年间，育三小学毕业生逐年增多，又苦于城区无中学，遂于光绪二十三年（1907年）八月，锦县基督教会成立了育贤中学一个班。课程设置有文学、数学、修身、英文、圣经等。当时教师不足、教材缺乏，各方面尚不完备。1926年，经奉天省教育厅批准立案。1928年，根据新学制，改为国民高等学校。新学制不许外国人担任校长，由孔雨春作为第一任中国校长。随后建楼房一栋，平房25间。后来因学生的爱国行为，育贤中学于1935年10月暂时停办。1936年5月复课，日语为主要必修课。1938年1月，育贤改名为私立育贤国民高等学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教育厅迫令学校停办。1945年，育贤学校又复校，改名为锦州私立育贤初级中学校，校长为王仁甫。1951年，育贤中学由锦州市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申请交由辽西省教育厅接管，改为“辽西省锦州工科高级职业学校”，并任命原校长王仁甫为校长；并将“锦州私立初级中学校”（人民中学）并入“锦州工科高级职业学校”。

育贤中学是锦州城区第一所中学，于清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成立，经过民国、伪满、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新中国五个时期共计45年。<sup>①</sup>

自“九一八”事变后至1940年，可以说是吉林境内基督教发展的高峰期。尤其吉林市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东北重镇，且是省会所在地，是爱尔兰基督教长老会传教的重点，英人牧师大部分驻于此地。因此，1921年爱尔兰基督教长老会决定在吉林筹办私立文光中学。

文光中学，是一所接受基督教会津贴的私立普通初级中学。1921年秋由吉林四恒表局经理赵洁凡、男施医院副院长郭玺荣、英国宣教士柏基根等三人创办，校址设在吉林高大夫胡同（今昌邑区江湾路江华胡同17号，即第三中学的前面）。最初借用吉林东关教会教室一间，设一个小学班，学生30人。1923年秋改办初级中学，借用柏基根牧师住宅楼做教室，后有所发展，1928年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立案。1929年秋，吉林省教育厅拨款补助，修建体育场、图书馆等。文光中学的经费主要来源是中华基督教东北大会拨给的津贴，其次是学费，再次是有时得到一点社会捐助。培养目标主要是为社会培养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向上一级学校输送新生；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学制三年，教师队伍实力较为雄厚，都是大学毕业，学生成绩普遍较好。学校不限制中国教员参加任何政治党派，但要求不在校内学生中搞党派活动。学生报名资格限高小毕业，民族有汉、满、蒙、回、朝，不问宗教信仰。<sup>②</sup>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师生中一些人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活动。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文光学生参加了声援运动，在英国牧师府门前举行示威游行。1938年伪吉林省教育厅通令该校停止招生，经惠彰德牧师（英）交涉，虽恢复了招生，但教育厅收买了文光中学的房地产及一切设备，1940年被迫停办，伪吉林省教育厅将该校改办吉林市第六国民高等学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籍教师被驱逐，他们的住宅被该校占用。1946年复校。1948年3月吉林市解放，学校停办。<sup>③</sup>

<sup>①</sup> 政协锦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锦州文史资料》，第九辑，1990年版，第100—103页。

<sup>②</sup> 政协吉林省吉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吉林文史资料第四辑—吉林教育回忆》，1985年版，第130—132页。

<sup>③</sup>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

据统计，黑龙江省具有代表性的基督教会中学有 2 所。一所即商业中学，由基督教信义会于 1920 年在三育小学校内增设商业中学一个班。1928 年扩建校舍，盖起两层楼房。1933 年，因经费不足而停办，这个“戴帽”中学共办 13 年。另一所为呼兰广育中学，由英国苏格兰长老会英籍牧师孙文彬于 1909 年创办，校址设在呼兰县城内信德胡同。1916 年迁至城西北隅教会院内。1919 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广育中学也有几名同学参加游行，在教会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此后英国差会借经费不足将中学停办。<sup>①</sup>

表 4. 近代中国东北主要基督教会中学一览表

地域	学校名称	创办人	校 址	时间（年）	
				起	止
辽宁省	三育中学	（英）马钦泰	海城东北角	1890	1921
	文德中学	（英）德教治	辽阳东五道街	1913	1940
	文会中学	（英）孟中原	新民镇南	1907	1940
	育贤中学	——	锦县	1907	1951
	培英中学	柏 卫	大孤山	1912	1919
	文华中学	（英）谭卫纶	奉天大东门外东关	1915	1950
吉林省	文光中学	（英）柏基根 赵洁凡等	吉林高大夫胡同	1921	1948
黑龙江省	商业中学	——	哈尔滨道外保障街	1920	1933
	广育中学	（英）孙文彬	呼兰信德胡同	1909	——
	敬业中学	——	阿 城	1919 前	——

注：本表参考了《辽宁省志·宗教志》（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吉林省志·宗教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黑龙江省志·宗教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以及《哈尔滨市志·宗教 方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等相关资料。

### （三）教会高等学校

所谓教会大学是指由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像西方对中国发生影响的许多事例一样，教会大学的建立是出于西方人的需要，而不是中国人的需要。”<sup>②</sup>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大学的目的是，就是要培养能够效忠于教会的中国领袖人物。他们公开宣称：“为中国开辟近高等教育先河之导，及以为政治、实业、教育、宗教各界中造就名贵领袖。”<sup>③</sup>沈阳是东北教会高等教育的中心。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基督教会在此创办两所教会大学，一所为综合型——沈阳文会书院，另一所为专业型——奉天医科大学。尽管数量不多，存在时间不长，但却是东北教会学校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

<sup>①</sup>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哈尔滨市志·宗教 方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13 页。

<sup>②</sup> [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66 页。

<sup>③</sup> 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37 页。

的一部分。

### 1. 文会书院

它的建立可追溯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一日，英国苏格兰与爱尔兰两个长老会在奉天大南关租用民房，成立一所小学，光绪三十年增招初中班。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迁到大西边门外一经街，继续购地建房，作为校址。1910年学校主要建筑物最后落成，后定名为“文会书院”，专办高等教育，院长由苏格兰人劳担理牧师担任，有中外教员共8人，学生近80名。1914年，丹麦基督教信义会出资合办，又增加三层楼房一栋。1920年，增设中学，并于奉天省教育厅立案。1924年，因改革学制，停办大学班，全部改为高级中学，设文理两科高级课程。东北易帜后，私立学校须在教育部注册，规定外籍人不得任校长。从1929年起，校长由中国人担任（首任中国校长马明良），当时在校学生70余人。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宪兵特务刁难学校，校长又换成丹麦教师惠德本担任。1932年春，“国联”派李顿调查团到奉天，调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罪行。校长惠德本将学校师生揭发的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罪行的材料，秘密转交给李顿调查团。1942年12月，该学校被伪满政府强迫停办，学校被伪满国奉天省教育厅占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教会办过教育的知名人士刘仲明、高墨泉等人，发起组织教会教育筹备委员会，将文会高级中学恢复。1946年9月2日正式复校。1950年9月1日，学校因经费困难而停办。当时沈阳市轻工业局借用校舍办工科高级中学，借期为15年。<sup>①</sup>

“文会书院”系大学性质，为丹路德会、爱长老会、苏长老会合办。该校分为本科和预科。预科学制一年，学习普通课；本科学制三年，分法、理、医、工四个系。主要招收县教会中学毕业生及教友、长老和学校中教职员子弟，目的是普及耶稣教，传布西方思想文化，使教会领袖适应时代潮流。<sup>②</sup>当时的毕业生可以从事牧师、教员以及自选的职业，也有少数去英美留学的。

### 2. 奉天医科大学

其前身可追溯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司督阁医师为解决盛京施医院医务人员不足问题，在医院附设培养医务人员学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并督促司督阁成立正式医校。1912年，由英国长老会与丹麦信义会联合创办奉天医科大学，这是当时在东北具有现代化设备和条件的最高医学学府。司督阁为首任校长。学校规定修业年限为五年，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每一年招生一次。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共40名。1912年9月成立学校董事会，聘请中国、英国、丹麦三国的知名人士为董事。1914年，又招收第二届学生40名，因宿舍不敷用，于是在小河沿东建筑一座两层宿舍楼房。1917年，呈请北京教育部立案，8月奉教育部令，改名为奉天医科专门学校。1922年，将每届招生数量压缩为20名，表示重质不重量。1924年，将修业年限增为六年，即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医院实习一年。同时决定每年招收一届学员，并兼收女生，当年录取女生4名，男生16名，共20名。1925年，遵照教育部新章，增聘中国董事。1930

<sup>①</sup>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省志·宗教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sup>②</sup>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中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6页。

年，遵照教育部章程要求，取消预科，添设先修科2年、本科4年，医院实习1年，修业年限改为7年。从1931年起，政府每年补助大洋5000元。1932年，日本侵略者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学校又称奉天医科专门学校。1938年1月，按照伪满洲国新学制改为四年毕业。当时全校男生108名，女生26名，在籍学生实数为134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奉天地区属英国系统的宣教士全部被俘，后遣送回国。奉天医科专门学校脱离教会，成立财团法人，学校改名为财团法人盛京医科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盛京医科大学改名为辽宁医科大学，附属的14个医院，也都完全归属中华教会东北大会医药委员会领导。1946年，英籍教授、医师们陆续重返奉天，经营办理医科大学。1948年，奉天解放，学校师生、医院医务人员和全体职工脱离教会，要求政府接管。<sup>①</sup>

奉天医科大学以造就医学人才，供给东北三省需求为宗旨，并且欲达将来基督教医务人员遍布东北各地之目的。<sup>②</sup>奉天医科大学是西方教会在东北三省经营各类学校中最大的一所。该校得到中国地方政府的经费支助，在生源方面也得到很多方便。

#### （四）教会女子学校

“中国女子学校之设，始于教会，继而国人也渐有私设学校者。这些教会和国人私办的女子学校，便打开了中国女子教育的一道窄门。”<sup>③</sup>基督教会女校在东北的创建，对东北近代女子学校的产生、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1. 奉天私立瞽目重明女学校

圣书公会德儒博夫人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发起筹备，至光绪二十八（1902年）在小河沿北上坎正式成立奉天瞽目重明女学校，并开始应用瞽字。初期为私塾，规模较小，到1932年学生增多，由英国差会及丹麦基督教信义会出资修建了新校舍，历任校长大都系英、丹两国人担任，经费由两国基督教会供给，至1940年英人校长回国，才由中国人齐恩荣担任校长，直至1952年结束。当时重明女学校的课程设有《国语》、《政治》、《算术》、《自然》、《历史》、《音乐》、《体育》等和编织、摸字、缝纫、烹饪、查经等科目，设幼稚班（初学摸字者）、初小、初中（1-2级）。其教育方针是为失明女生设立类似基督化式的大家庭，教导他们学习技艺，作为生活补助，同时教导她们学习日常生活，并必需的文学和常识，可用于社会生产和服务人民。本校只招收学生膳费，除免收学杂费外，对贫困学生的膳、衣等项，学校在可能范围内，酌情提供。除免收学生膳费外，按成绩优劣，工作勤惰，给以少许酬金。该校经费除差会及不同时代“政府”支持外，还自有耕地39960平方米，养鸡、羊、蜂等，种植蔬菜，并出售学生加工的编制品，作为经济支出。自重明女校创立起毕业学生总数共计151名，多留校，还有的被介绍到各处充任编织教师、盲人指导或作基督教传教士等。<sup>④</sup>

##### 2. 坤光女校

<sup>①</sup>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省志·宗教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

<sup>②</sup> 齐红深：《东北地方教育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sup>③</sup> 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台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sup>④</sup> 政协沈阳市大东区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大东文史资料》，1991年版，第115—117页。



这是一所常经费“由苏格兰和爱尔兰两差会暨中西教友逐年募集，源源供给”的带有教会性质的学校。<sup>①</sup>1911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创立奉天基督教女子师范学校。1915年将长春基督教女师范并入，改称为奉天坤光女子师范学校（今辽宁省肿瘤医院内）。1920年，增设初中。该校学生均系奉、吉、黑三省基督教信徒子弟，一律住校，日常生活严守宗教仪式，早晚礼拜，要读圣经。除星期日列队到东关教会作礼拜外，平时一律禁止外出。校长为英国苏格兰女宣教士廉爱邻，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对校内行政、训育、财务以及检阅学生来往书信、夜查宿舍等大小事情，完全一手包办。1925年，增设高级中学。“五卅惨案”后学生走上街头示威集会，遭廉爱邻禁止和迫害。后来爱国学生的呼吁得到了伪奉天省教育厅的支持，当时奉天省女师学校，将被开除学生全部录取。1936年，奉天坤光女子师范学校停办，改称奉天私立坤光女子两级中学校，校长换由中国人张尔谦担任。1940年底，学校被伪满洲国政府接办。1946年秋，学校恢复，廉爱邻又回奉天办校。奉天解放后，当时盛京施医院、医科大学、坤光女子中学的全体师生、医护人员和职工，要求政府接管，坤光女子中学并入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sup>②</sup>

### 3. 基督教立育英女子小学校

据相关资料记载，此校为英国宣教士伊约翰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成立。校址设在锦县东关双岔子（现市第五初中南墙外）基督教施医院内，初取名育英女子蒙学堂。设校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基督教的宣传和培养基督教骨干。除教学文化课外，还让学生学神学、做礼拜。招生最初只限教民子女，其后也招收非教民子女。当时的地方政府对它既未指导，也未干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根据清朝的学堂课程，改女校为锦县基督教立育英女子两等小学堂。学生分初、高等两部分；初等修业5年，高等修业4年。高等小学设修身、国文、英文、算术、体操、音乐、图画等学科，初等不设英文。由于当时社会上女子进学堂的风气未开，该学堂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仅有初、高等各一级，学生总共50~60名。<sup>③</sup>

### 4. 辽阳文德中学女校

辽阳基督教会牧师韩弥尔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东三道街教会院内，设立初级小学一所，招收学生十七、八名，因受旧礼教影响，专收男生，另设女校。教会女校租用了四道街曹姓民房。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不许女子读书，但西方基督传教士提倡男女平等，设立女学，不收学费，所以一般信徒家庭受此影响，有适龄女子多送入学校读书。第一期有学生二十多名。课程有汉文，特请汉儒负责教授，科学由英国人明教士（女）负责教授。所用文具由学校供应。当时社会黑暗，流氓十混甚多，单身女子夜间不敢在街头行走，故女生多在校住宿，雇用厨役，设立食堂。庚子之变，和男校一样，同时解散。<sup>④</sup>

### 5. 长春萃文女子中学

校址设在今长春市基督教会附近的西五马路小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国

<sup>①</sup> 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辽宁文史资料》，1991年版，第207页。

<sup>②</sup> 政协沈阳市大东区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大东文史资料》，1991年版，第130—131页。

<sup>③</sup> 政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员会学习文史办公室编印：《凌河文史资料》，1989年版，第47页。

<sup>④</sup> 辽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辽阳文史资料》，1985年版，第75页。

人金瑞慈（女）教士，先创办初等女校，定名长春纯粹女学堂。1912年增招女子师范班，学生50余人，是关东长老会创办的第一所女子中等学校。1915年将女师范班并入奉天坤光学校，长春女学堂改名长春萃文女学校，专办小学。1918年附设幼稚园。1930年，学校董事会决定专办初中，聘中国人史子麟为校长。1933年，得到王荆山的多方援助，学校开始扩建。1937年7月，初中改为高等学校，全称私立新京萃文女子国民高等（相当于中学）学校，学制四年。1939年改称私立新京萃文女子初级中学校。1942年被日伪政府接管（今长春市第四中学前身）。<sup>①</sup>

#### 6. 哈尔滨三育小学女校

苏格兰长老会派英籍邓女传道士于1925年创办阿城文育女子小学校，经费完全由长老沈阳东北大会支付。初创时定名为纯英女子小学校，后改名为文育女子小学校，学生80余人，分3个班。东北沦陷时期因受日伪当局压力，曾一度停办。1933年又重新整顿，并增设高级2班。发展成初高两级女子小学校，1938年共有学生151人，教员6人，成为当时颇具规模的小学校。东北沦陷后停办。<sup>②</sup>

为了更直观的了解基督教在东北建立教会女校的情况，兹制成近代中国东北主要基督教会女校一览表（见表5）：

表5. 近代中国东北主要基督教会女校一览表

地域	学校名称	创办人	校址	时间（年）	
				起	止
辽宁省	重明女校	张永权等	奉天小河沿北上坎	1902	——
	坤光女校	——	今辽宁肿瘤医院内	1915	——
	育英女校	（英）伊约翰	锦县东关双岔子	1895	——
	文德女校	韩弥尔	辽阳四道街	1897	1900
	慎德女校	（英）米爱仁	奉天	1900前	——
	文化女校	郭慕深	——	1912	——
	崇正女校	聂乐信	东沟孤山东关	1912	——
	崇实女校	孟宗原	新民	1905	——
吉林省	女子小学	——	伊通	1894	——
	义务女校	——	通化	1909	——
	萃文女校	（英）金瑞慈	长春西五马路	1907	1942
	文化女校	（英）邸如春	吉林高大夫胡同	1911	1942
	半月女校	——	延吉县头道沟	1927	——
黑龙江省	三育小学	——	道外保障街	1923	——
	文育小学	（英）邓女	阿城	1925	——

注：本表参考了《辽宁省志·宗教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吉林省志·宗教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哈尔滨市志·宗教方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相关资料。

<sup>①</sup>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sup>②</sup>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哈尔滨市志·宗教方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综上所述，由于面对金发碧眼的“洋人”，东北人民不但视其为怪物，而且自然地有着对侵略者的排斥心理，传教士布道异常困难，切口难寻。故初创时期的教会学校大都比较简陋，规模小，数量少，程度低，经费困难，教学活动不正规，在发展过程中完全从属于“福音”传播。一个传教士到某地，以教堂为依托，招收几个无家可归的孤儿，聚集传教，附设简单的读写算知识，即为学校。教师由传教士兼任，所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以宗教内容为主，相对于后来教会学校的发展而言，这时的教会学校教育对我国东北的教育影响并不大。巴斯蒂认为：“这些最早的学校不论其宗旨如何，总是从外国移入中国的。传教士开设这些机构，……目的是想要移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及思想态度。传教士们想要进行的是一种道德、精神的创造。这些学校的教育就是以此为核心的。”<sup>①</sup>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学制的确立，新式学校的涌现，中华民国的建立，为教会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大好时机。福开森在 1902 年中国教育会第四届年会上大声呼吁：“教会学校应该增加课程，提高教育水平，改进实验室和图书馆设备，提供比中国公立学校更高水平的教育。”<sup>②</sup>这便成了多数热心教会教育事业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共识。东北地区当然也不例外，其标志就是设学数量的增多和中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到 1912 年奉天医科大学的创办，标志着一个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到女学等不同层次和类别的颇为完整的基督教教育体制在东北建立起来，对近代东北的教育、医疗、科技乃至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确切来讲，基督教传教士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拓展办学空间，其根本用意在于通过办学来更好地为教会服务并取得渗透自己价值观念的主动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

<sup>①</sup> 许美德、巴斯蒂：《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4—5 页。

<sup>②</sup> 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0 页。

### 三、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历史评价

我们对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进行历史评价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对其最终发展成为主观意图与实际效果迥然相异这样一条轨迹，更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客观分析，而不应有失偏颇。

#### （一）教会学校旨在为“基督征服中国”服务

教会学校从 1842 年凭借不平等条约开始创办，直至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收回教会学校的法令，才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历经了近百余年的时间。基督教在中国办教育的目的，正如在创办教会学校方面颇具声名的狄考文（C. W. Mateer）所说的那样：“传教士是为着基督教的利益而来中国办教育的”。<sup>①</sup>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遵循了这一宗旨。他们在制定培养目标、确定课程设置和安排教学内容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如沈阳“文会书院”主要招收县教会中学毕业生及教友、长老和学校中教职员子弟，目的就是普及耶稣教，传布西方思想文化，使教会领袖适应时代潮流。另据《凌河文史资料》载，“基督教立育英女子小学校设校目的是要进行基督教的宣传和培养基督教骨干，除教学文化课外，还让学生学神学、作礼拜。”<sup>②</sup>在东北的许多教会学校里，《圣经》都作为必修课，而且每日必读。新民高中、岫岩三育小学等就是最好的例证。尤其是奉天坤光女中，“学生均系奉、吉、黑三省基督教信徒子弟，一律住校，严守宗教仪式，除星期日列队到东关教会作礼拜外，平时一律禁止外出。”<sup>③</sup>正如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监督高智更所说：“教会学校与一般学校不同，它是宗教和教育的结合体，是为宗教而教育，没有宗教就没有教育，也就没有学校。”<sup>④</sup>又如传教士狄考文于 1877 年在中国基督教传教士会议上说：“教育不可能代替传教，传教第一位是无可争议的。”<sup>⑤</sup>由此可见，基督教会近代中国东北创办教会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成为一般人民的教师和其他领袖人物”，<sup>⑥</sup>进而彻底征服、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文明”，最后把中国纳入基督教的势力范围。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进行其‘殖民事业’时，传教士常常被使用为先驱者，基督圣经被看作是和炮舰同样有效而相济为用的武器。”<sup>⑦</sup>传教士们与西方殖民者同

<sup>①</sup> 朱有瓛、高时良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94 页。

<sup>②</sup> 政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员会学习文史办公室编印：《凌河文史资料》，1989 年版，第 47 页。

<sup>③</sup>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省志·宗教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28 页。

<sup>④</sup> 转引自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91 页。

<sup>⑤</sup> [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1 页。

<sup>⑥</sup> 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4—15 页。

<sup>⑦</sup>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63 页。

船东来，并借助于船坚炮利对中国的武力打击和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而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图谋将“基督”变成中国“唯一的王和崇拜对象”；而作为其差会工作一部分的教会学校，也与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一同走进中国，它们根在外国，权在教会，学校为教会服务，严重地侵犯了我国的教育主权，因此尤为国人反对。随着1924年爆发全国规模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东北人民收回教育主权也势在必行。从张作霖时期开始<sup>①</sup>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成立，东北的教育权经历迂回曲折才真正得到收回。

毋庸置疑，“基督教设学，初以劝教，与造就布道人才为宗旨。”<sup>②</sup>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1890年，狄考文在《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事业》一文中说：“虽然教育本身具有很大好处，但是这些好处并不足以促使教会动用金钱，和它的男女信徒们去奉献自己的力量。”<sup>③</sup>一位主持教会学校的美国传教士曾这样谈论教会学校的目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成为基督教的宣传工具，从这里将培养出具有教徒般的热情和信心的青年，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传播耶稣福音”。<sup>④</sup>甚至他们还得意地叫嚣：“依此等教会之力，中国几无地不通英语。于此可见美英人在华经营事业，实得无上之便利也。”<sup>⑤</sup>如海城三育中学从成立到解散，将近三十年，旨在以宗教思想奴化麻醉中国青年，培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奴仆为目的。<sup>⑥</sup>由此可见，办教育仅仅是传教的手段，把创办教会学校的终极目的与教会的命运联系起来，是教会学校的重要特征。综上，基督教会在中国东北创办教会学校的实质就是在中国建立上帝之国，使中国基督化。体现这一目标的最形象的口号就是“基督教占领中国”（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或“中华归主”。

## （二）教会学校客观上推动了东北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基督传教士在中国东北办学尽管是“以学辅教”，但仍能立足，并有很大程度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在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中国东北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加速了东北教育近代化的进程，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据《辽宁省志·教育志》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奉天设有小学2040所，中学3所；到1934年，小学增至5738所，中学130所<sup>⑦</sup>。期间，基督教会学校对东北教育事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教会学校将西方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育体制引进中国东北。传教士们认为，“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她涌来。”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教会是聪明的话，它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国开动这个强大的机器。”<sup>⑧</sup>在教学方法上，实行分科、分班、分级教学。如奉天私立瞿目重明女校开设国语、政治、算术、音乐、体育等课程和编织、缝纫、烹饪、查经科目，设幼稚班、

<sup>①</sup> 齐红深：《东北地方教育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页。

<sup>②</sup> 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页。

<sup>③</sup> 朱有瓛、高时良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sup>④</sup>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2页。

<sup>⑤</sup> 陈俶达译：《欧美人在中国之教育的实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4页。

<sup>⑥</sup> 政协辽宁省海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海城文史资料》，1988年版，第20页。

<sup>⑦</sup>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省志·教育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7—887页。

<sup>⑧</sup>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70页。

初小、初中（1—2级）。海城三育中学的“马师娘”采取分班流水式教法，以期达到口笔兼能、读写并重，认真进行严格的口语基本训练，教学效果较好。同时，教会学校还注重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育，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验能力，沈阳文会书院的新楼西部为化学实验室，“作试验时，学生每人分得必需的仪器一份”。<sup>①</sup>在教育体制上，恰如主持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情况大型调查的罗炳生（E.C.Lobenstine）所言：“教会应同时兴办大、中、小学校系统，其教育质量不应亚于国立学校”<sup>②</sup>，这样一整套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完备的教会教育体制，成为东北教育近代化的参照品和借鉴物。

第二、教会学校不仅传播基督教，还教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并且注重实用人才的培养。教学内容除了宗教神学课以外，一般都设有西学课程，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四书五经之外的广阔天地，并激起他们探求新知的强烈愿望。在近代中国动荡不安、教育事业难以发展的状况下，教会学校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师资，培养出了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据统计，从1901—1920年间全国范围内基督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从事大学预科者1720人，教牧工作296人，医生295人，护士126人，律师49人，教师1093人，受聘在教会工作者1423人。<sup>③</sup>而当时东北教会学校的毕业生，除了从事宗教事业外，更多的从事文教、医务、机关等方面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东北教育的不足。如海城“三育”毕业生择优保送，去邮政、海关、铁路、电报等各机关的有三十余人，教徒均认为“美差”，因而纷纷送子弟入学；沈阳文会书院的许多毕业生都受聘为教师，或作为海关、铁路、邮政、盐务等通晓英语的办事员；奉天医科大学虽以培养基督教义务职员为宗旨，同时也为东北三省造就了许多医学人才。

第三、教会女子学校的建立，冲破了千百年来“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为中国妇女争取到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能够学习新学问、接受新事物。据《辽宁文史资料》载，“奉天坤光女中至1930年已达16个班级，包括幼稚园、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和师范班。共计有学生400余人，教师26人，经费由以前的不足万元增至2万余元。”<sup>④</sup>尤其是“重明女校自创立起毕业学生达一百五十一名，多留校，还有代为介绍在各处充任编织教师，或作盲人指导。”<sup>⑤</sup>东北教会女校的发展由此可窥一斑。在辽阳文德女校，由于“当时社会重男轻女，不许女子读书。基督传教士提倡男女平等，设立女学，不收学费，所以一般信徒家庭有适龄女子多送入学校读书。”教会学校以平等的姿态吸收女子入学，“为我国女子教育启开一扇窗子，改善了少数女子的生活，并给予国人以相当刺激，开中国女子教育之先声，也是功不可没的。”<sup>⑥</sup>

教会学校对我国普及教育也有所促进。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加上长期封建专制统治，

<sup>①</sup> 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辽宁文史资料》，1991年版，第195页。

<sup>②</sup>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sup>③</sup>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中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04页。

<sup>④</sup> 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辽宁文史资料》，1991年版，第207页。

<sup>⑤</sup>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省志·宗教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sup>⑥</sup> 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台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教育很不发达。据统计，到 1918 年，在华教会学生总数约 35 万名，而当时非教会学生约 530 万名，教会学生所占比例约 7% 弱。<sup>①</sup>这就是说，在普及教育方面，教会学校的作用约占 7%。另外，在吉林文光中学，一些传教士带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感，“事业心强，严于律己，竭尽全力，以校为家，虚心学习，团结互助，虽有外校高价延聘，亦不肯离去”<sup>②</sup>。在沈阳文会书院，“教师对待学生，不申斥，不直接批评，都是通过自治启发学生的自觉性。”<sup>③</sup>教会学校这种民主办学的精神，对中国传统的呆板机械的教育体制是一种挑战，同时也启迪了民主思想的萌发。

国人余日章在 20 世纪初说：“中国新世，学校之创立，精神形式，悉有基督教会梯山航海，转运而东，基督教对于中国教育之一途，为今日新教育规履，早为国民公认。”<sup>④</sup>传教士贾菲力也曾言，教会学校的创立“使中国各种学校，……引起其发奋之心，或相与规摩以求则效，或力图完美以自振兴”<sup>⑤</sup>。如基督教会育贤中、小学分别是锦州城区的第一所中、小学，它们经历了清朝、民国、伪满、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新中国等五个时代，<sup>⑥</sup>在当时影响颇广。不可讳言，基督教会学校以其先进的管理模式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对中国近代东北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借鉴和促进作用，同时也“为促使中国教育的新陈代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sup>⑦</sup>。

---

<sup>①</sup>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34 页。

<sup>②</sup> 政协吉林省吉林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吉林文史资料第四辑—吉林教育回忆》，1985 年版，第 135 页。

<sup>③</sup> 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辽宁文史资料》，1991 年版，第 199 页。

<sup>④</sup> 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史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36 页。

<sup>⑤</sup> 朱有瓛、高时良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7 页。

<sup>⑥</sup> 政协锦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锦州文史资料》，1990 年版，第 103 页。

<sup>⑦</sup>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13 页。

## 结 论

近代以来，伴随着鸦片、商品和大炮，欧风美雨飘打下的中国也毫不例外地沐浴了基督教上帝的“洗礼”。尽管传教士们借助条约特权的保护打开了在东北传播“福音”的通道，但由于民众的排教情绪异常激烈，传教士在东北的初期传教工作步履维艰，收效甚微。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变通手法，通过创办教会学校作为传播基督“福音”的平台。教会学校从 1842 年凭借不平等条约开始创办，直至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收回教会学校的法令，才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基督教会逐渐在东北建立起一个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到女学等不同层次和类别的颇为完整的基督教教育体制。毋庸讳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传教士在华办学提供了可能；而中国社会向来重视教育的传统以及救国富民的强烈愿望又为传教士在华办学提供了舞台。

基督传教士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拓展办学空间，其根本用意是要学生明白基督教教义，及训练他们为传教之助手，要对中国人进行一种道德、精神的创造，即通过办学来更好地为教会服务并取得渗透自己价值观念的主动权。美国牧师裨治文说，传教士来华，“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但不管怎样，这种移植在中国土地上，按照西方模式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促进了东北教育向近代的转型，同时也加快了东北走向世界的步伐。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东北创办教会学校，最终发展成为其主观意图与实际效果迥然相异这样一条富于特色的轨迹，完全是其计划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教会学校毕竟是“基督教运动的副产品”，它的一切转变，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中华归主”的目的而进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 参考文献

- [1] 薛虹, 李澍田主编. 中国东北通史[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 [2] 佟冬主编. 中国东北史[M]: 第五卷.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 [3] 王魁喜, 吴文銜, 陆方, 等. 近代东北史[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 [4] 常城, 李鸿文, 朱建华. 现代东北史[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6.
- [5]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G].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6.
- [6] 宋荐戈. 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
- [7] 安树芬. 中华教育历程[M]: 上卷.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 [8] 金忠明, 李若驰, 王冠. 中国民办教育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9] 陈景磐. 中国近代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 [10] 齐红深. 东北地方教育史[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 [11] 卢燕贞.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M]. 台北: 文史出版社, 1989年.
- [12] 高时良. 中国教会学校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 [13] 卫道治. 中外教育交流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14] 章开沅. 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15] [美]杰西·格·卢茨著. 中国教会大学史[M]. 曾钜生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 [16] [美]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M]: 上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17] [美]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M]: 下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Z]: 第三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 [19]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G]: 第一册.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 [20]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21]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22] [韩]李宽淑. 中国基督教史略[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 [23] 胡卫清. 普遍主义的挑战: 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24] 史静寰, 王立新.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 [25] 黄新宪.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 [26] 何晓夏, 史静寰. 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 [27] 陶飞亚, 刘天路. 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 [28] 朱维铮主编.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29]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30] 顾长声.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 [31]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 [32]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 基督教会史[M]. 孙善玲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Z].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34]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G]: 上, 中, 下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35]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G].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 [36] 李楚材.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G].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78.
- [37] 朱有瓚, 高时良.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G] (第四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 [38]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G].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 [39] 李桂林. 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G].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 [40]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G] (下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 [41] 武强. 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G] (第一辑).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
- [42] 武强. 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G] (第二辑).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3.
- [43] [英]司督阁. 奉天三十年[M]: 上卷. [日]矢内原忠雄译. 东京: 岩波书店, 1938.
- [44] [日]千田万三. 满洲文化史·点描[M]. 大阪: 屋号书店, 1943.
- [45] [日]芝田研三. 满洲宗教志[M]. 大连: 满铁社员会, 1946.
- [46] [日]川名公平, 矢泽利彦, 平川祐弘. 中国キリスト教布教史[M]: 第八卷、第九卷. 东京: 岩波书店, 1982.
- [47] [日]松尾为作. 南满洲ニ於ケル宗教概観[M]. 教化事业奖励资金财团, 1931.
- [48] 辽宁省档案馆,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 [49] (清)徐世昌. 东三省政略[M]. 李淑田等点校.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
- [50] 王树楠, 吴廷燮, 金毓黻, 等. 奉天通志[M]. 沈阳: 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3.
- [51] (清)西清. 黑龙江外记[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 [52] 辽宁文史研究馆. 辽海鹤鸣[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 [53] 马维权主编. 黑龙江宗教界忆往[G].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 [54] (清)阿桂. 盛京通志[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7.
- [55] (清)长顺, 李桂林. 吉林通志[M]. 李淑田主点.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 [56]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辽宁省志·宗教志[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2.
- [57]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辽宁省志·教育志[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1.
- [58]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吉林省志·宗教志[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 [59]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吉林省志·教育志[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
- [60]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黑龙江省志·宗教志[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61]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黑龙江省志·教育志[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 [62] 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 沈阳市志·宗教志[M].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4.

- [63] 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 沈阳市志·教育志[M].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8.
- [64] 田志和, 马鸿超, 等. 长春市志·少数民族·宗教志[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 [65] 长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长春市志·教育志[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 [66]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哈尔滨市志·宗教 方言[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 [67]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哈尔滨市志·教育 科学技术[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 [68]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志[M]. 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 1992.
- [69] 通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通化市志[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6.
- [70] 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营口市志[M]: 第一卷.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2.
- [71] 辽中县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 辽中县志[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 [72] 新民县县志编纂办公室编. 新民县志[M].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2.
- [73] 北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镇县志[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 [74] 法库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法库县志[M].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0.
- [75] 安德才主编. 兴城县志[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 [76] 岫岩县志编辑部编. 岫岩县志[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 [77] 许敬文主编. 东沟县志[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
- [78] 中国人民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刊行. 辽宁文史资料[G]: 总第三十三辑, 1991.
- [79] 中国人民政协沈阳市大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刊行. 大东文史资料[G]: 第一辑, 1987.
- [80] 中国人民政协沈阳市大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刊行. 大东文史资料[G], 第二辑, 1988.
- [81] 中国人民政协沈阳市大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刊行. 大东文史资料[G]: 第五辑, 1991.
- [82] 中国人民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刊行. 沈阳文史资料[G]: 第三辑, 1982.
- [83] 辽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刊行. 辽阳文史资料[G]: 第一辑, 1985.
- [84] 中国人民政协锦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刊行. 锦州文史资料[G]: 第九辑, 1990.
- [85] 中国人民政协辽宁省海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刊行. 海城文史资料[G]: 第三辑, 1988.
- [86] 新民县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印刊行. 新民文史资料[G]: 第三辑, 1990.
- [87] 中国人民政协吉林省长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刊行. 长春文史资料[G]: 第五辑, 1984.
- [88] 中国人民政协吉林省吉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刊行. 吉林文史资料[G]: 第四辑—吉林教育回忆, 1985.
- [89] 四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刊行. 四平文史资料[G]: 第二辑, 1988.
- [90] 中国人民政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刊行. 延边文史资料[G]: 第二辑, 1984.

- [91] 中国人民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刊行. 黑龙江文史资料[G]: 第十三辑, 1984.
- [92] 中国人民政协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刊行. 哈尔滨文史资料[G]: 第二辑, 1983.
- [93] 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近代史资料[G]: 总八十号, 八十二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94] 杨齐福.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11).
- [95] 丁柏传, 郑瑞君. 近代中国教会学校述论[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0(2).
- [96] 吴洪成. 传教士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1997(2).
- [97] 刘林海. 基督教会与中国民办教育[J]. 新东方, 2003(9).
- [98] 吴洪成. 中国近代教会高等教育的历史审视[J]. 社会科学辑刊, 2002(5).
- [99] 王红信. 简论中国近代教会学校[J]. 邢台师范高专学报, 2001(4).
- [100] 胡卫清. 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评价新论[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1999(4).
- [101] 顾莹惠. 教会学校与中国近代教育[J]. 苏州大学学报, 1994(2).
- [102] 赵慧峰.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效应[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1997(4).
- [103] 赵启重. 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J]. 松辽学刊, 1995(2).
- [104] 吕达. 近代教会学校课程的特点及其评价[J]. 教育评论, 1990(3).
- [105] 陈建明. 略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与适应[J]. 宗教学研究, 2002(4).
- [106] 卓新平.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双向契合[J]. 世界宗教文化, 1997(2).
- [107] 胡卫清. 论近代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J]. 学术研究, 2001(7).
- [108] 张书丰. 山东教会学校教育九十年[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0, 12(4).
- [109] 辛彦怀. 对中国近代教会学校的认识与评价[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1993(1).
- [110] 杨齐福. 教会学校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J]. 扬州大学学报, 2000(3).
- [111]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兼评〈剑桥中国晚清史〉关于基督教在华活动的论述[J]. 历史研究, 1989(3).
- [112] 刘金玉. 中国近代基督教教会学校的生成探讨[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4(1).
- [113] 石磊. 教会学校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J]. 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 2000, 3(1).
- [114] 张文举. 基督教近代入华作用及性质的再认识[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2(5).
- [115] 李勇忠, 李春华. 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与教会学校的两重性[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5).
- [116] 张广智. 近代中国对基督教入华的反应——一项现代新史学的理论诠释[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3).
- [117] 王伦信.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启动与基督教教育策略的调整[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999(4).
- [118] 王冬凌. 试论中国近现代教会学校的发展轨迹及特点[J]. 大连教育学院学报, 1997(1).
- [119] 王立新. 十九世纪在华基督教的两种传教政策[J]. 历史研究, 1996(3).

## 后 记

在我启笔后记之时，首先让我想到的是为我们开课的导师们，你们的每一句话常常成为我灵感的来源和追问的起点。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转瞬即逝，但你们精彩的授课、严谨的治学、淡泊儒雅的品格，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在这里，我由衷地感谢帮助我完成学业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的各位老师。

论文虽然凝聚着自己的汗水，但却不是个人智慧的产品，没有导师的指引和赠予，要想完成这篇论文是不可想象的。在这里，尤为感谢我的导师高乐才教授。在恩师的谆谆教诲与精心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终于如期完成。从搜集资料到拟定题目，从开题到定稿，每一步无不倾注了高老师的心血，凝结着高老师辛勤的劳动。回想三年的读研生活，从高老师身上，所汲取的不仅仅是史学知识，其中更深刻的东西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我的未来。这是我一生都应当珍视的宝贵财富，高老师的智慧和思想将永远在我心中，让我受益一生。在此向导师高乐才教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我的师兄师妹们，三年来默契的交流和往来是难得的机缘，我希望永远将这种机缘持续下去。还需要特别感谢邱广军师兄，就研究方法和论文资料的建议和给予，已经落实到我的论文中。

感谢于百忙之中参加我毕业论文答辩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感谢我坚实的脊梁和后盾——我的父母和关心爱护我的朋友！